

# 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

刘 劲

(白银市建设银行,甘肃 白银 730900)

[摘要]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出土,为研究天水市及周边县区的行政建制变迁、地理环境变化以及史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,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,学界对木板地图的争议颇多,甚至出现截然不同的推断结果。笔者通过实地考察,并结合历史典籍记载,对木板地图作了自己的判断,以供研究者借鉴。

[关键词]天水放马滩;秦国木板地图;天水历史

[中图分类号]K877.5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1)06-0009-02

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出土后,学界对其纷争不已,未有定论。今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,结合历史典籍记载,对木板地图作一探讨。

## 一、木板地图的拼接及指示方位问题

对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,部分学者认为其四块松木应为一整体,故而进行了六幅成品图的编缀工作,然而由于其排布位置不同,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大相径庭。

为了找到最合理的解释,笔者仔细观察了四块松木,发现第一块B面是A面的局部描绘,第四块B面又与第二块上部相切合,第四块A面和第三块A面是同一图的两个类型,第二块下部为第四块A面与第三块A面的总图。按照此逻辑关系,六幅成品图根本无法编缀,换句话说,木板地图的拼接问题是个伪命题,当舍之。

在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上,标有一“上”字,该“上”字究竟是何含义,历来众说纷纭。归纳起来,不外乎有两种论点:或曰南为上,或曰北为上。经笔者考证,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描绘的是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。笔者曾将该图与实际情况相对照,发现“上”字正居于东方位置,既非南,亦非北。为何会出现此类状况呢?依笔者所见,当与古人阅读、书写习惯有关。我们知道,古人写字是从右向左进行的,其绘图亦当遵从此惯例,自东方起,经南北,终于西方。顺其理,“上”为南北之论皆谬,宜背之。

## 二、木板地图的水系问题

通过对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的观察,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地名——故西山,它的出现,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秘的钥匙。2004年至2010年11月,国家有关考古机构对西汉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调查,确认礼县县城西山遗址始建于西周中晚期,礼县永坪之赵坪与永兴之间的大堡子山遗址建造年代较晚,为春秋早期。<sup>①</sup>而大堡子山在历史上也曾称为西山,那么两个西山谁是“故西山”呢?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,结合第一块B面图样,得出“故西

山”为礼县县城西山的结论。因为在图样中,“故西山”位于两条较大河流之间,符合此条件者,非礼县县城西山莫属。

“故西山”位置确定后,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内容也就迎刃而解,此当为西汉水水系中上游流域图。由此可知,夹“故西山”之两河,一为由湫山河与肖河汇集而成的燕子河,一为谷峪河。“广堂”所在河流当指礼县捷地与盐官之间诸流。“中田”所在河流为稠泥河。“炎成”当处于犭水河流域,因红河、草坝地区在秦国亦为重要城邑,故作者描绘较细。

经笔者访察,发现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描述的是两个水系——西汉水水系和渭河水系,其中与西汉水水源地相距不远,但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,只有谢家河(永川河)。

对于木板地图第四块B面,其虽有“广堂史”一名,但经笔者详察,“广堂”与“广堂史”未在同一处,亦即二者分属不同水系。通过笔者访察,发现该图与藉河水系比较吻合,只“小秋”一处未能定位,疑为环境影响所致。经对比查看,笔者以为,木板地图第二块上部亦为藉河水系,其与第四块B面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。

对木板地图第二块下部、第四块A面、第三块A面之水系,学界莫衷一是,但笔者发现图中河流带“上”、“下”者颇多,这告诉我们,该河流向为自北往南或自东往西。查天水市及其附近自东向西流的只有西汉水,但其具体环境与图中描述不符,故舍之。自北向南流的河流其地虽有多处,然符合图中描绘的,只有流经木板地图发现地的花庙河。

## 三、木板地图的几个地名问题

经笔者考证,木板地图第一块B面中,“故东谷”在礼县古泉、圣泉、东台一带。“故西山”前已叙及,此不多言。“广堂”在礼县盐官附近,“中田”在稠泥河附近之天水市王家铺、刘坪一带,“闭”位于今天水市杨家寺乡,“山格”在礼县红河乡附近,“明溪”即礼县上杨家,“炎成”在礼县庄窠地一带。

在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,“南田”居礼县祁山一带。“略”在渭河以南、葫芦河与西山村之间偏西地带,符合此条件之地,当为天水市新阳镇。“鄠”位于永川河与渭河交汇处,似为今天天水市马跑泉镇。“邽”在牛头河东部、渭河北地,当为今天天水市社棠镇。

木板地图第一块A面中最重要的地名,无疑就是“邽丘”。其位于永川河西部,居于渭河与天水市平南镇之间,在新阳镇东南偏南地带。依笔者浅见,此“邽丘”当为今天天水市皂郊镇。有学者言,“邽丘”为天水市区或北道埠,然后者恰居渭河之上,前者离西汉水源头过远,均与图示不符,宜谨慎待之。

#### 四、木板地图的作者身份问题

放马滩1号秦墓共出土竹简460枚,其中一部分是甲种和乙种《日书》,另一部分为《墓主记》,《墓主记》虽仅有7枚竹简,但它却为确定墓主身份及地图绘制年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。通过对《墓主记》简文校释可知,墓主丹本名樊野,曾为公孙衍门客,因在韩国地界射伤韩国贵族,被迫自杀,但其深通法术,故而未亡。后在公孙衍的帮助下,逃到秦国,终老于邽县。

在墓主丹所在的1号墓中,共有随葬器物33件,除12件日常用品外,其余为木板地图4块,竹简1卷,毛笔及笔套,算筹、木尺、木槌、木匕、木棒、木屑、木板等。其中,毛笔与竹简置于棺内,其余物品均在棺椁之间。由此可见,墓主丹是以精通地理、风水、医学和占筮数术而见长的术士。有些学者认为,随葬的木板地图是丹为官府所用的见证,其实不然。木板地图的随葬,充分证明官府不需要此类物件,而绘制木板地图的目的,就是为了看风水、占吉凶等。

#### 五、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

要确定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,《墓主记》提供的信息当为首要选择。查《墓主记》中共有四个时间标志,按简文顺序依次为“八年”(赤呈文时间)、“七年”(丹伤人自刺时间)、“三年”(丹复活时间)、“四年”(丹身体康复时间)。由于这几个年份未标明是自然纪年还是王公纪年,故凭此无法直接判断出丹在邽县的大致活动时间。

既然凭《墓主记》直接判断不了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,那只有借助于旁证。前文已提及,丹为公孙衍舍人,换句话说讲,二人系同时代人物。结合《史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古籍记载可知,魏国人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(前333)在秦国,为大良造。九年(前329),张仪入秦,公孙衍与之不和,遂弃秦回到魏国。秦武王二年(前309),张仪死。“张仪

已卒之后,犀首(公孙衍)入相秦。”据此可推知,公孙衍主要活动在秦惠文王时期,那么丹亦当生活在秦惠文王时期。由此亦可推知《墓主记》中的四个年份,凭逻辑关系,四个年份中的“七年”、“八年”必属秦王纪年,而“三年”和“四年”则为顺序纪年。察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曾更元,若“七年”、“八年”同属更元前或更元后,在逻辑关系上无法讲通,但如果“八年”在更元后,“七年”在更元前,那么年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据笔者推算,木板地图绘制年代概在秦惠文王更元元年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(前324~前317)之后的一段时间,当属无误。

#### 六、木板地图作者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

关于丹是否被官家起用的问题,自木板地图出土以来学术界便争论不休,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其曾担任下层佐吏一说,因迄今未见任何直接证据,故舍之。从丹的墓中随葬物可以看出,除了其日常用品外,剩下的大多是阴阳行头,丝毫见不到刀笔吏之物。换句话说,丹从未在官家任职,终其一老,只倚仗“日者之术”为生,当为事实。这里,我们不妨做一个场景回放——丹伤人后,为免刑罚,运用法术在众人面前自刺,从而蒙蔽了众人,后在公孙衍和公孙强的帮助下,逃到秦国,辗转来到邽丘。在邽丘,丹从事占筮吉凶、鬼神禁忌活动的同时,以其巫家医术为百姓治病(当代在礼县、天水地区的某些“阴阳”亦有此术),赢得当地群众的尊敬和官家的好感,尤其是其掌握的地理测绘之术,更是获取了邽丘地方官赤的信任,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。秦惠文王更元八年(前317),在丹的授意下,赤以公文形式郑重向上级推荐丹,上级如何应对,未见相关资料,但是从谒册(《墓主记》)被随葬来看,可知上级退回了谒册,也就是说,上级对其人不感兴趣。或许受此事件打击,在秦惠文王更元八年(前317)后的不长时间,丹在绘制木板地图第三块B面时突然病倒,不久溘然长逝(可从第三块B面仅绘出山系及水系,无注文这一点看出)。丹去世后,赤出于同情,将其精心绘制的木板地图和自己的谒册予以随葬,算是对亡者的一点慰藉。

综上,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是先秦时期绘制水平最高的地图,其作者丹是一位“阴阳”(礼县、天水地方话,系指风水术士),未在官家担当过职务,其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(前324)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(前317)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绘制了木板地图,有总图有分图,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天水地区的地貌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,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.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[J].文物,1989,(2).
- [2]司马迁.史记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.
- [3]班固.汉书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
- [4]朱熹.孟子集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- [5]张觉.韩非子译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- [6]杨天宇.周礼译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- [7]林剑鸣.秦史稿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.